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一帶一路」：挑戰與機遇

絲路與歐亞舊大陸的中心地位



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吸引了不少人的興趣，數以千計來自全世界的學者、社會運動家、商人和政府官員都致力了解其意義。這個倡議歸根結底是關乎它能夠為參與者帶來甚麼樣的發展契機。探討它如何運作的研究不計其數，對中國的企圖也有諸多猜測。在这一切之下的假設是：中國政府有一個發展倡議，而每個參與其中的夥伴，都認為此倡議會直接對自己有所裨益。

現有的文獻數量極多，我無法一一閱讀。香港處於這項倡議的前沿，香港人應比所有其他人更清楚箇中底蘊。所以我還是回到歷史學家的立場，從世界長期歷史的角度看看這個倡議如何符合歷史發展大勢。有些人可能知道我與我的同事黃基明曾有一系列對話，探索世界歷史中的歐亞大陸^①。我們檢視了這個舊大陸上三個歷史悠久的世界文明，這三者分別以地中海、南亞和東亞為中心，彼此透過歐亞大陸的陸地互相聯繫。

一 歐亞舊大陸

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看，這個歐亞大陸有五千年見諸文字的歷史，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長久和連貫；其他地方當然也曾有國家和社會，但如果沒有把歷史記載下來，我們就無法詳細知道它們的事情。然而，歐亞大陸上的人有幾千年以文字記載的歷史，令我們對於這個超級大陸上的人類經驗產生一種強烈的連續感。當然，這個歐亞大陸很難定義。在我的書中，歐亞大陸

* 本文原為王廣武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一帶一路」公開講座（香港亞太研究所及全球中國研究計劃主辦，2017年11月14日）上的演講稿，題目是“Silk Roads and the Centrality of Old World Euraisa”，嗣經整理、翻譯為文字稿。

是指歐洲、北非和我們今天所稱的亞洲。我們仍在嘗試從零碎的考古和人類學發現去重構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歷史，但它們與歐亞大陸的早期聯繫尚未能確定。歐亞大陸的不同之處，在於各文明在整個歷史記錄中密切聯繫，往往縱橫交錯。我嘗試了解這些聯繫所孕育的結果，發現這個故事的各部分內容並非都同樣豐富，我們對於某些部分的所知會比另一些部分要多一點，但故事當中的相互聯繫已足夠密切，可以從中建構出有意義的圖景。

這是歐洲人在五百年前橫渡大西洋發現新大陸前身處的舊大陸。發現新大陸後，南、北美洲變成全球格局的一部分，人類故事的走向也開始改變。今天我們可能會問：這個歐亞舊大陸是否仍然重要？抑或它只屬於全球歷史的一部分，已無法重拾昔日榮光？有關這個舊大陸的文獻記錄指出，它仍然具有可以發揮的作用。顯然，它過去是多方爭逐角力的世界，充斥大量暴力和野蠻行徑，但它也是各文化持續互相接觸的世界，令幾個文明的發展得以加強。同時，它也是一個幾千年來由相對和平的海上貿易連結起來的世界，這些貿易聯繫令許多經濟體變得富裕。

這個舊大陸分為四個主要部分，其中三部分有獨特而綿延久遠的文明，第四部分則通過長期接觸和競爭與前三者聯繫。我不打算詳述它們之間如何交流互動的細節。

簡單來說，誕生於地中海的文明大概最為古老。它起源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後延伸至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希臘、羅馬的城邦模式分別發展，之後向東與一神論的亞伯拉罕諸教相結合。這首先導致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諸國間爭奪支配權，之後也引發信奉伊斯蘭教的東方諸國間爭奪支配權，激烈的鬥爭持續了幾個世紀，所爭奪的權力包括野心勃勃地想要控制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貿易，而位於這一端的就是印度和中國的富庶王國。最後，這促使西歐國家橫渡太平洋和印度洋，並建立決定世界近代史走向的強大海軍。

至於印度和華夏文明，它們歷史悠久又有韌性，在西方霸權威脅之下，奮力掙扎求存直到今天。這兩個文明處於亞洲邊緣，一個位於印度次大陸，以恆河為中心；另一個位於中國，以黃河、長江為中心。把這兩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聯繫起來的，是歐亞大陸廣袤地區上的游牧部族和綠洲城鎮，它們中間的蠻荒之地長期協助這三個文明彼此交流。那些聯繫大大塑造了近代之前至少二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不同於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歐亞大陸，今天的全球化歷史相對短暫。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以及由大西洋橫渡到太平洋的長期接觸和拓殖定居所孕育的發展機會，創造了我們的全球海洋世界。促成這種發展的原動力自十六世紀開始，原本主要是為了經濟目的，但不久就導致爭奪支配權和建立帝國的政治和戰略鬥爭。這個政治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尤其重要，因為它推動了一個遍及全球的嶄新現代化過程。雖然這個過程令我們彼此更為相似，聯繫更為緊密，但同時也在每個國家和社會注入難以消解的嚴重分歧和張力。這就是自十八世紀以來所創造、我們今天所繼承的世界。

在二十世紀，經濟動力由大西洋一端移到另一端，並以美國為其中心。美國帶着地中海歐洲文明的種子橫越重洋，從一個以往不為人知的角度，開啟了光照全球史的新方法。在過去半世紀，新大陸以其經濟和軍事力量主宰世界——這是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身處的現實。在這種脈絡中，世界正懷着愈來愈濃厚的興趣去觀察經歷大衰落後的中國努力復興的過程；看到中國如何逐步重拾世界兩百年來未見中的地位，令人為之讚歎。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偉大文明的中心，這個文明一絲不苟、有條不紊地記錄它的歷史，令人民萌生一種關於其歷史的強烈連續感。在過去三千年，中國的文明經歷和渡過了許多挑戰。不同於一些古文明在它們的國家衰落後就消失湮滅，中國是一個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國家，幾度經歷興衰。

二 中國存續的經驗

「中國人」在歷史上一直在變化，這點必須強調。中華文明並非如某些書籍所描述那樣停滯不前；把中國形容為經歷幾千年歷史而一成不變，是不符合事實的。秦漢統一天下前的中國，不同於帝制王朝的中國；秦漢時期的特點是漢人開始形成了相似的價值觀和信念，這是他們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然而這只是開端。漢朝覆滅後，當時的「中國」經歷了三百年動盪歲月。造成這些變化的主因，是邊疆游牧民族大軍入侵，尤其來自北方和西方的胡人。之後是超過二百年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與之相伴的是宗教和政治轉型。胡人領袖的統治遇到不少抵抗，但因應新的社會和經濟形勢，也出現許多採納、適應的情況。及至隋唐時代這個帝國重新統一後，再次結合在一起的「中國人」已是與之前相去甚遠的一群人。

如果看官修歷史記錄，我們或許會覺得中國歷史在連續性方面沒有任何中斷。但如果小心閱讀這些記錄，就會清楚知道中國人經歷了很大變化。最顯著的例子是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傳入。受到佛教思想和實踐的刺激，本土道教徒重新詮釋自己的傳統。向外部世界開放的益處極大，那時對外關係的發展十分可觀——不只沿着後來稱為「絲綢之路」的陸路，還取道直達印度洋的「海上絲路」。到了隋唐天下統一的時代，我們看到一個迥異於以往的中國。熟悉華南發展的人會知道，當地的越人要到唐代才自認是中國人。對他們來說，成為唐人就是成為中國人，唐人就是唐朝子民。

其後是文化鞏固時期，宋朝統治者致力保存他們的文化傳承，使之不斷完善，令中國社會和經濟出現長足的進步。但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來自東北、蒙古和中亞西部的的新統治者接連入主華北大部分地區，最終統治全中國。中國人反抗並最終建立明朝，重新統一全國。儘管中國人極力誘導侵略者接受中國文化，但事實證明他們不可能不吸收外來統治者所帶來的新影

響——最顯著的是蒙古人帶到中國的一些科技概念和技藝，而他們的一些統治方式也獲保留下來。

中國人對於外來意念如何回應和採納，尤其是致力恢復漢唐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的明代精英的做法，引起人們很大興趣。現代的研究顯示，征服王朝確實令社會的不同層面發生變化，這點在1644年後滿洲人入主中國期間更為明顯。清朝統治者巧妙地把滿人制度與儒家政府結構融會在一起，創造了混合式的滿漢雙軌管治體制，採用超過二百五十年。

中國有超過一千五百年受外國勢力和意念刺激而變化的歷史；所謂停滯的中國等待西方到來把它從沉睡中喚醒，那種說法完全是誤導人的。中國常常反應緩慢，對改變也是不情不願，並為遲滯付出了沉重代價，但中國人對於不斷出現的挑戰和變化還是有所回應的。當然，中國人擁有固有的韌性，那是源自一套核心價值觀和實踐，而它的基礎繼承自秦漢「革命」。這個核心由體現連續性和身份認同感的典籍和正史所支撐，令中國和它的管治理想得以存續。

中國精英愈來愈嫻熟於以儒家原則治國，他們如何採納新意念和尋找機會令中國變得更強大和易於防守，是引人入勝的故事。他們成功從失敗和外族征服中學習，久而久之令中國幅員變得更廣大和結合得更緊密。比較明清兩朝的地圖，往往令人驚訝於中國的邊界擴張了多少。在兩百年間，中國的土地面積確實增加了一倍。自1912年至今，中國領袖仍然在學習如何處理清朝納入這個國家版圖的歷史疆界。

但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中國在十九世紀初仍然十分強大，並因其成就而深受尊敬。不過，它一開始衰落就一落千丈。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領袖低估了英國人和其他歐洲民族帝國帶到亞洲的新型力量，新一波全球化的核心因素以海上支配權為基礎，與之相隨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由這種經濟體系所支持的帝國擴張超越美洲，到達非洲和幾乎亞洲全境。處於亘古未有的大變局中，中國人發現他們沒有應對這個挑戰的答案，並不得不經歷超過一百年的動盪。這是歷史上中國首次須同時面對由海陸兩路而來的敵人。

近年來中國人重新探討鄭和的海上遠征，那時中國是海洋霸主，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海軍。鄭和七次前往印度洋，確定該處沒有敵人，但其後明廷認為不值得再花大量金錢來做這些海上航行。由於北方正受到來自陸路的敵人威脅，於是中國人改為投入巨資建造長城，決定放棄海上優勢。這並非失策，而是對於現實情況明智務實的反應。那時中國所需的主要是足以對付海盜和管束貿易商的海防部隊，以致四百年後他們面對由極有效率的經濟制度所支持的現代海軍，就顯得無能為力。對於這個以農村和農業為主的國家而言，由於他們沒有全盤革新所有知識，那個挑戰實在大得無法克服。

中國的衰落已廣為人們研究，這裏無需贅言。必須強調的是敵人不只從海上來，還來自陸上，那就是沙俄擴張。俄國應對西歐帝國主義的方式是向

中亞和北亞擴張，直指清代中國的邊界。值得一提的是由兩個平等國家簽署的首條現代條約，即1689年由中國人和俄國人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西方視之為非比尋常，但在清朝統治者眼中，這是中國應付陸上強敵的正常做法。以往從海上來的都不是敵人，而是被當作可以規管和控制的貿易整體。因此，當新的海軍強國變成對他們不利的敵人時，中國人驚訝不已。

中國經濟在1840年後也開始急速衰弱。應對這個挑戰的答案，是向外國資本主義企業學習，以獲得足夠知識來與它們競爭。但中國人不久就發覺，僅這樣做已不足以濟事，因為他們在條約中所做的讓步給予外國公司太多優勢，要廢除整個條約體系才有機會取得成功。回到過去不是答案；把整個局面徹底重組來讓中國人獲得公平競爭的環境，這點不可或缺。這並不完全是中國的夢想，但它不久就被視為中國重拾世界地位的前提條件，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都在追尋這個未來的願景。然而，如果中國人仍然分裂，這就不過是夢想；只要他們四分五裂，外國勢力就可以繼續插手以謀取利益。日本人甚至侵略中國，以期分裂這個國家，欲使它的每一個部分都受他們控制。

在那時候，所有人都知道，除非中國統一，否則不可能再次富強起來。因此，中國在1949年重新統一，是經過一個世紀中國人所稱的「百年屈辱」後的首項成就。自此，局面可以開始徹底重組，以便構思有效的長期發展計劃。當時正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時期，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別無選擇，只能選邊站。由於意識形態原因，他們在這個全球鬥爭中只能接受蘇聯領導。在他們接見尼克遜(Richard M. Nixon)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後，中國最終成功脫離蘇聯這個大集團，並向美國靠攏。

我在上文提供了一個概述，強調中國人在歷史上多次渡過難關並恢復的能力。那麼當下的挑戰是甚麼？領導人過去致力推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已知道走這條路沒有前途。鄧小平大膽決定以採取資本主義制度作為邁向社會主義的方法，但他仍然想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在物質財富層面，他的改革十分成功，令中央政府重新獲得軍事和政治實力。鄧小平所選擇的道路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出乎中國人和所有其他人意料的是，蘇聯崩潰了，共產主義思想不再為人信奉。對那些畢生奉獻於革命以建立共產主義世界的人來說，那場災難是極大震撼，他們至今還沒有完全從中恢復過來。他們自此開始學習如何應對全球市場經濟，並為自己尋找新的角色。在過去四十年的鄧小平(及後鄧小平)時代，中國人利用經濟武器來確保發展和達致富強，這是他們為了全面恢復其世界地位所需要的。

三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

中國在世界上取得的地位，是一百年前無法想像的。它從1970年代的狀態復興，速度之快，實在令人驚訝。我年紀夠大，記得1945年二戰結束時中

國的模樣，到處貧窮匱乏，民不聊生。中國從那時候一路走來，取得今天的成就，實在令人十分讚歎。現在中國更加富強，因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報告流露自信，不像以往那樣以謙退的立場來看中國。習近平認為這個國家如今能夠在多方面擔當領導，是中國很久以來沒有能力做的事；他因而能夠說，中國應當在世界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巧合的是，其他正在發生的事情也令中國人相信世界正在起變化，而且在多方面有利於中國。這種情緒貫穿於十九大所表達的信息中。

前路仍有許多挑戰，有一些是新的，另一些則由近期歷史遺留下來懸而未決，這些挑戰仍會教人憂慮一段時間。其中一個新挑戰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已備受討論，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它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注意，並強調不會掉入這個陷阱。這樣否認，顯示他們很嚴肅地看待這個挑戰。

「修昔底德陷阱」的名稱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他總結雅典和斯巴達的經驗，認為當崛起大國挑戰原有大國時，最終會互相衝突並導致戰爭。對相關歷史甚為熟悉的著名政治學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更指出，這種情況在歐洲多次發生，其他地方大概亦復如是。他找到許多關於這種情況出現的例子，並警告說，崛起大國幾乎無可避免會迫使原有大國以開戰來遏止挑戰者崛起。

近代最顯著的例子是德國和日本。德國成為崛起大國時，英國的反應是嘗試削弱它的力量。這引致雙方一連串複雜的行動，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日本是另一個崛起大國的例子，雖然它不如德國般強大，但仍然威脅到英美兩國在世界這一端的利益。結果衝突無可避免，日本突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傾全力去擊敗日本。

人們用這兩個例子來類比中國為崛起大國，美國為原有大國，因此必須嚴肅看待兩國難免會有一戰的可能性。中國人仔細研究過當中論據和事例，似乎認為德國人和日本人的作為，與他們現在為中國發展所做的事不能相提並論。我認為中國人從歷史中汲取了足夠知識，了解德國人和日本人在哪裏出了差錯，並相信自己不會重蹈覆轍。大家應該希望他們是對的，而且他們會極力避免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失算，不給予美國人開戰的理由；要是能做到，就不會踏入這個陷阱。

中國人能否成功，目前還言之尚早，因為中美雙方都將面臨這個陷阱一段長時間。同時，有另一個挑戰更令人擔憂：這個挑戰源自更為近期的事件，它沒有被稱為陷阱，但或許可以視為在不穩定的勢力均衡與積極圍堵之間一連串經計算的冒險行動。我所指的是，過去一個世紀尤其是冷戰四十年間大多數戰略家的心中構想。因為冷戰最終以一方完全勝利告終，所以沒有被稱為某種陷阱。在全球冷戰期間，美蘇兩個新興強國所採取的方法和政策主導了戰略思維。它們最終引致蘇聯共產黨崩潰，美國宣布大獲全勝。之後

美國的戰略雖變得多元化，但是積極圍堵的戰略仍然在檯面上。簡而言之，其理據是：能有效對付強大的蘇聯的措施，也能用來成功對付共產中國。

比喻從來難以若合符節。對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重要的恐怖平衡，蘇聯的反應是集中力量，建立盡量能與美國匹敵的力量。中國人的反應則不同，他們專注於發展經濟，包括利用最新的資本主義手段去支持他們的社會主義目標。大家須注意，習近平上台後最早做的事情之一，是要求共產黨人學習蘇聯崩潰的教訓，他顯然十分嚴肅地看待此事。他也鼓勵黨員閱讀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著作，以協助他們了解革命成功後可能會發生甚麼差錯，以及是甚麼因素令美國今天如此強大。這兩個例子都顯示他多麼留意歷史教訓。最重要的是，他密切關注冷戰的結果。那肯定是寶貴的教訓，重要性不亞於鄧小平小心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有些美國和中國領袖確實希望避免冷戰時期摧毀蘇聯的情況重演。然而，在五角大樓和中國的國防部門有很多證據顯示，兩國有些戰略家繼續以冷戰思維來思考。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在背後支持台灣獨立，以及中國竭力想統一台灣。如果任何一方想以戰爭來打破僵局，就隨時會引發極端的挑釁。在美國方面，有些人因為有成功先例可以依循而受到鼓舞，相信施加壓力圍堵中國，就能像摧毀蘇共那樣擊潰中共。如果中國的倡議者以相同的思路來思考，並且準備反擊那種策略，就可能觸發雙方都聲稱不想見到的重大衝突。因此，說不定冷戰思維是比「修昔底德陷阱」更真實和迫切的陷阱。

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挑戰背後，有着中美關係中一些明顯較陰暗的層面。中國人今天提出一些別出心裁的回應，其中之一是「一帶一路」。習近平初次談到絲綢之路時，許多人都注意到這個構思，但沒有人知道 he 會走多遠。現在很清楚 he 有着長遠考慮，而且心中有一個宏大的圖景。他不期望這個倡議會有立竿見影的成果，而明白它需要時間來實現，而且對各方尤其是鄰國來說是巨大挑戰，對中國亦復如是。

尤其耐人尋味的似乎是，「一帶一路」可以協助中國避免上述兩個陷阱。中國清楚指出，此倡議不是要挑戰原有大國，而是為了滿足地方和地區的需要，目前更要依靠參與其中的國家共同協作，結成夥伴。按照定義，它集中於歐亞舊大陸。習近平以這種方式指出，中國不想助長冷戰思維，並且致力避免與美國發生政治和軍事對抗。這代表了對舊大陸歷史——也就是前述的五千年見諸文字的歷史——的重新肯定和延續。那段歷史廣為人知，並能為未來構思的行動提供某種路向圖。

這個歐亞大陸是世界將近四分之三人口的家園。此外，人們預計最活躍的經濟發展會從大西洋移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從記錄所見，陸上戰爭在歐亞大陸上是常態，但是互相聯繫的海洋政體公開貿易，衝突不多。這個新的側重點是寄望繼續依賴全球海洋經濟——過去三百年這種經濟都是以北大西洋為中心，現在則由新大陸移往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這將同時喚起在世界

歷史上歐亞大陸佔據中心地位的想法。因此，那些涉及其中的人必須做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考慮這種似乎由「一帶一路」倡議所代表的對舊大陸的回應是否合乎現實。

如果它合乎現實，那就有兩個優勢。第一個好處是，今天絕大多數人口仍住在這個歷史上的歐亞大陸；我已指出，藉着專注於發展或恢復這個舊大陸的中心地位，就能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衝突。第二個好處是能藉此更廣泛地利用過去兩百年所積累的發展工具，它可以把歐亞大陸各個不同部分所擅長的實務技能集合起來，像現代科技、金融和基建投資知識，全是不同國家向資本主義發展學來的。這些國家現在了解到，它們可以利用這些促進相互聯繫的現代工具，把歐亞世界連結起來。除了用老法子，還可以尋找新路徑，包括優先滿足區域和本地迫切需要的陸上和海上新聯繫，而非那些只是服務於全球目的的聯繫。歐亞舊大陸正在培養能力去建立一組新的關係，令該地區發展時可享有更大自由度，擺脫由其他地方決定的優先次序。我不知道中國能否成功達成這個目標，但我認為，在中國人眼中，他們的未來繫於這個歐亞大陸，這也是協助他們重拾世界地位的方法。

四 新絲路

「一帶一路」是長遠的倡議，其成功仰賴持續經濟成長帶來的穩定。因此，我認為中國要令這個倡議成功，至少要達到三個條件：第一，中國必須保持統一；第二，中共須與中國過去的全部歷史聯繫起來，從而使其合法性不受質疑；第三，中國須有明確的未來，以得到人民的完全信賴。

全國統一令中國重獲主權並恢復人們對其安全的信心，這些都是過去百多年來它不曾擁有的。那種統一使這個現代國家與其過去重新聯繫起來，並令其人民確信中國已再次崛起。而這種統一狀態的核心，是其獨特的黨國體制的穩定性。我要強調，黨國不同於一黨制國家。在西方政治學文獻中，有關一黨制國家的著作已汗牛充棟。在一黨制國家中，某一政黨致力主宰國家，打壓其他政黨，不容許它們成功。然而，黨國把自己視同國家——也就是說，國就是黨。

這並非新鮮事物。在許多方面，1928至1949年間的南京國民政府就把國民黨視同國家。在政府大樓和辦公室內，國民黨與中國政府之間的聯繫以很生動的方式顯示出來——國民黨黨旗與中華民國國旗交叉懸掛。中共開始的方式很不同，它是按蘇聯模式建立國家的。到了現在，它認為中國的生存和復興須依賴中共，中共拯救了中國，兩者密不可分。黨國上接在中國實行兩千年的帝國，提供了歷史連續性。當然，兩者並不相同；取代皇帝的是整個黨，而不是其領導人。這就是為甚麼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盡心奉獻和廉潔奉公。因此，習近平決心令中共再次強健起來。

習近平須處理一個棘手的領域，就是釐清中共與法律之間的關係。傳統的皇帝凌駕在法律之上，但今天中共不想被人覺得它與被統治者距離很遠，而是認為自己負有新的神聖責任：不只握有權力，而且負有比舊制度更妥善照顧人民的責任。他們亟欲建立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這點十分重要。毫不奇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認為自己承接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時代，把自身聯繫到一個長期的歷史框架，接續清朝的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政府，並由此上承中國所有統治者的法統。

我們需要更深入探討這種連續性。它來自把所有知識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中國傳統：經和史，即典籍和歷史記錄，一直是最重要的兩部；另外兩部屬輔助性質，重要性不如經、史。經是治國之道的來源，幾乎都是靠朝廷的儒學者來解釋，尤其是在明清兩代。但史的根源更為深厚，一直上溯到遠古時代的記錄，從中可窺見這個國家的起源。這些記錄包括由《尚書》到《春秋》，乃至所有得到官方認可的文獻；自有歷史記錄以來，連續性都受到絕對尊重。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和歷朝的官修史書，無疑共同創造了「中國性」(Chineseness)的權威感。那種連續性成為精神支柱，提醒所有統治者如何克服來自沙漠、草原和高地外族的眾多威脅，以及如何處理內部分裂。所以，中央集權的統一狀態，素來是中國必須不惜代價捍衛的目標。

在中國人眼中，無論是否漢人，能夠維持統一就可令中國強大安全，而一脈相承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及其文明更為完整統一。隨着它的人口數量增加並讓更多人接受該文明，它的領土也愈益擴大。那種連續性由屬於史部的記錄一個又一個世紀傳承下來，塑造和補充經部的儒家典籍。今天的黨國仍然致力體現與過去政權一脈相傳的這種連續性，以確保它的現代化目標將承襲國家的豐富歷史文化。

這個統一的中央政府獲得法統的連續性後，其優先要務是想方設法鞏固已取得的成就。因此，中國領導人把目光投向國家疆域以外的地方。現在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明顯例子，顯示中國借助現代工具與歐亞舊大陸重新聯繫。它最初接觸的是那些以不同方式與中國分享共同歷史的鄰國。中國人明白往後的發展會不同於以前，因為這個世界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然而，從海上和陸上重新與那個世界聯繫十分合理。為此，有許多經驗能協助中國重建在歷史上曾存在的關係。當然，這不會只限於較和平愉快的關係；有些關係極端暴力，有些在歐亞大陸引致許多具破壞性的戰爭。中國須運用從歷史記錄中學得的一切，方有望把這個地區恢復到新的平衡，以獲得它想要實現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人確實深明需要採取平衡的政策。明清時代，他們在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失去平衡，過於關注大陸上的敵人，而忽視了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到他們發覺海上敵人也可能威脅其存亡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他們在過去一百年都在回應那個挑戰，現在重新發現海洋也可以非常有利於中國的經濟。鄧小平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改革，致力敞開中國的門戶，迎接海洋貿易和全球投資。全賴那些改革，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才得以如此成功。

這顯示鄧小平及其同僚多麼深刻了解中國需要平衡，尤其是要更關注海洋事務。自1990年代起，中國人投入巨大資源去建立真正現代化的海軍，並投資興建一些港口設施，希望確保能進出和安全穿越南中國海。現在他們在中國水域有一支可靠的海軍，可以前進至印度洋的港口，這是中國人認為自己需要的平衡的一部分。在那種脈絡下，「一帶一路」會否得到它成功所需的國際支持，目前還言之尚早，但這個倡議確實代表了中國渴望得到的平衡。

最後，中國能令人信服的未來，是習近平所形容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乍聽起來很陳腐，但它背後是中國回復昔日輝煌的百年夢想。過去三代領導人和思想家都希望達到他們能夠長久維持的復興，中國人現在相信，他們已可以宣布找到替代方案，以取代西方所提供的現代化模式。他們憑藉近年的成就所建立的政治結構，令連續性得以恢復，而這種連續性帶有黨國仍然珍視的歷史傳統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中國人相信自己已取得的成果，可以令他們更上層樓，因此不再猶疑於向世界宣告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這樣做的時機是否恰當，只有靠時間來證明。但習近平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言所展現的自信，明顯是其中國夢所繫的關鍵。

現在許多人把習近平與前任的強人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相比。有些比較很有用，但另一些則會令人誤會。例如，毛澤東和他那一代人為嘗試統一中國備嘗艱苦。他領導對抗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但在1949年取得勝利後，把矛頭轉向自己的同志，到文革結束時，幾乎摧毀了共產黨。無可否認在大部分時間裏，毛澤東都能遂其所願，做到他想做的事，但他也遺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亂局，這點清楚不過。習近平面臨的問題不同於毛澤東，他所繼承的制度深受尊重，這是他權力的來源。此外，他非常專注於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效能。

至於把他與鄧小平相提並論，其實兩人所要做的事也有根本差異。鄧小平完全顛覆了革命家毛澤東呼籲的階級鬥爭，並以舉世矚目的方式開放國家，接納資本主義方式。他敦促人民學習一切資本主義事物——只要這些事物有助塑造中國想要達到的那種社會主義。他認為，中國將能與世界上最出色的國家比肩，與它們一樣現代化和進步。相較之下，習近平決心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新時代已經來臨。從毛澤東的錯誤和鄧小平的成就汲取教訓後，中國已經到達這個階段。如今人所共見的變化，令人們能以嶄新的眼光看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五 為甚麼是社會主義？

「為甚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提醒我們，百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現代化和進步。因此，習近平提出的理想需要一面旗幟，用來代表為未來世代謀求的進步——他似乎認為馬克思最能代表那樣的未來。不同於列寧、斯大

林甚至毛澤東，馬克思的名字是中國的黨國可以毫無疑慮地接受的。今天的中國領導人知道不能靠孔子的名字，因為這個名字代表不了大多數中國人渴望的進步；他們也認為一些令較早世代的人為之神往的英雄人物，如洛克(John Locke)或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達爾文(Charles Darwin)或凱恩斯(John M. Keynes)，對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已不再有意義。

相較之下，馬克思是致力於社會改革的學者兼哲學家，他提出的理念是世界上好幾代人追求進步大業的基礎。馬克思對於歷史階段進步的分析，姑勿論準確與否，畢竟能讓中國人以全然不同的新方式來思考進步。可以說，進步的理念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所信奉的最強有力的理念之一。該理念有助他們走出過去黃金歲月的陰影，擺脫不斷想回到古代價值觀的執著。事實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受進步的理想所啟發。中共更進一步，贊同馬克思的想法，認為歷史變化的每一階段都會最終推動整個社會走向更高階段。因此，在中國追求未來進步的那面旗幟上，最適合的標誌似乎是馬克思。至於這會否帶來共產主義社會，在此階段無人知道，也很少人真正關心。此時，進步是中國人能夠相信的事物，而與馬克思相關連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現時能夠公開主張的理念。

鄧小平已證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不一定互相矛盾。創造財富和科技發明是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它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積累財富的方法，而財富可以在人民之間公平地重新分配。我記得鄧小平說過一句名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剩餘價值可供再分配，那並非好事。一部分人必須先富起來，然後才可以再分配財富和實行社會主義。因此，資本主義的技術、方法和創新，有助於社會主義變得切實可行。無論如何，如馬克思所說，這種社會主義是繼資本主義之後出現的階段。

中國特色又從何而來？這很難準確指出，因為在中國國內似乎正在討論和爭辯諸多可能性。我留意過一些討論，但至今仍無法肯定這些辯論會得出甚麼結果。現代意念和價值觀的範圍十分廣泛，中國年輕人似乎也很樂意採納它們。有些是一時流行和流於膚淺的，而且好像無所不包和能夠一蹴而就。有些人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價值觀會包含自由和民主，但似乎接受這樣的轉變只能按部就班，需要人民把它們融會內化，成為未來的思想傳承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則認為，如果這種價值觀只是從西方全盤照搬，則難以持久。中國人並不排斥有普世價值觀的想法，許多人相信中國可以提供自己的一套普世價值觀。不過，威脅黨國體制和中國穩定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總是會受猜忌。

看到中國人正在向外部世界學習並且學得如此快速，這令人有所啟發。中國人在幾乎每一條戰線、每一個知識領域都在競爭，嘗試與創造該知識的人媲美，甚至更勝一籌。在全中國，人們普遍的想法是無所不學，無所不精，這是源自鄧小平改革的大轉型的巔峰，習近平因此能夠很有信心地宣告中國邁入新時代。中國人能夠和願意學習，清晰體現了他可以仰賴的一個中國特色。這種止於至善的追求，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可敬特質之一。鄧小平

所做的不過是重新打開門戶，讓人民可以去學習所能學的一切。並非所有文化都有這種特點；有了過去四十年的成功，現在中國領導人可以說這種精神根源於儒家思想，而所有中國人都應力求培養這種精神。

習近平和他的同事相信，對於中國未來的問題，人們已有答案，不需要追隨美國和部分西歐國家提供的自由化發展模式。有些歐洲國家把那種模式加以修改，以達成它們的社會主義目標。雖然大部分美國人不接受那些目標，認為不適合他們，但大多數歐洲人並沒有那樣排斥，有幾個歐洲國家公開表明要推行程度不一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人或許不想追隨那些道路，因為他們對於這些國家的政治價值觀在中國是否切實可行懷有疑慮，但他們現在相信帶有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可行的。

簡言之，在某些中國領導人眼中，這個問題的癥結似乎在於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至於它是以資本主義知識、革新和創意為助力的社會主義，還是為了實現某種再分配而經修改和溫和化的資本主義，則將是由人民來選擇。細看之下，這兩組選擇之間的差異並非大得無法彌合，歸根結底只是側重點的問題。如果需要強大的競爭動機以促進發展活力，那就應以資本主義方法為優先；然而，一些社會主義元素使國家變得公平，並滿足更多人民的需要，社會最終會因此得益。這樣，資本主義方式輔之以公眾管理的政策，就會有足夠自由去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替代選擇須界定一個不同的目標，還要以大多數人民的福祉為重。為了令它實現，就須利用資本主義制度和方式，使這個經濟體能獲得可供再分配的財富；這種差異或許往往會分化國家和制度。我不能預計未來會帶來甚麼，但是，習近平斷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進步的一方。由於這個目標，優越的資本主義方法都應予以採用，只要它們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並使之能為人信任。現在中國人致力復興絲路，並把重點放在恢復歐亞舊大陸的中心地位，可以視之為避免與美國人信奉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抗之舉。如果世人相信中國的倡議是一種進步的方法，旨在為中國和鄰國造就更公平的社會，而不是對美國制度的威脅，那就可以成為有助相關國家合力建設一個更安全的世界的一小步。

林立偉 譯

註釋

① Ooi Kee Beng, *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4). 中譯本可參考黃基明著，劉懷昭譯：《王廣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